

Annihilation from Within

国家的自我毁灭

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军控和裁军总署前主任

弗莱德·查尔斯·依克莱◎著

瑞士日内瓦高等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相蓝欣◎译

“弗莱德·查尔斯·依克莱对现代以来的历史做的引人入胜的描述，解释了世界主要大国在内部遭受灭顶之灾时能否生存下去的这个新时代。”

——亨利·基辛格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Annihilation from Within

国家的自我毁灭

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军控和裁军总署前主任

弗莱德·查尔斯·依克莱◎著

瑞士日内瓦高等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相蓝欣◎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的自我毁灭/(美)依克莱著;相蓝欣译.—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ISBN 978-7-5617-5944-8

I. 国… II. ①依…②相… III. 科学技术—影响—国际
政治—研究 IV. 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5879 号

国家的自我毁灭

著 者 弗莱德·查尔斯·依克莱
译 者 相蓝欣
策划编辑 周 洁
文字编辑 陈 朴
责任校对 侯俊华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6 开
印 张 6.25
字 数 79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
印 数 6000
书 号 ISBN 978-7-5617-5944-8/D·134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中文版序言

弗莱德·查尔斯·依克莱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所有民族国家的生存都带来威胁。政府领导人和他们的智囊应当理解这种威胁的历史根源。他们必须设法捍卫自己的国家,避免新技术带来的危险。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解释这种日益增长的威胁,并提出防范的措施。

全球化并没有降低民族国家维持世界政治秩序的关键作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为了防止国际秩序失控的状态,大国的作用仍然是必要的。我们目前所处的时期同历史上所有的时期有根本的不同,因为,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唾手可得。大规模杀伤的科学技术很容易被恐怖组织、邪教团体和其他的暴力犯罪团伙所获得,所以国家安全日益受到威胁。

为什么人类能够在新科学技术上取得如此骄人的进展,却反而不能维持政治秩序? 对于中国这样有几千年历史的国家来讲,新科学技术在全球的蔓延只能算是近期出现的新事物。这种蔓延源于 18 世纪的欧洲,也就是后来称之为“现代”的那个新历史的开端。当时欧洲的哲学家们宣布,人类思维的基础应当是理性,科学必须要突破宗教信仰约束。这个针对宗教的哲学新思

路使科学活动更加自由,并让科学成为工业革命的主导力量。

从那以后,科学技术的新观念开始向美国、日本、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传播,即使在穆斯林世界也有一定的影响。今天,欧洲国家在科技方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但在很多重要的领域,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和美国,处于领先地位。

18 世纪以前,科学技术同宗教、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和谐相处。今天,人类文化已经分裂成两个领域:科技领域以经验积累的方式不断取得突破,而社会 - 政治 - 宗教领域则在传统的禁锢之下以向后看的方式得以维持。不幸的是,科技进步的速度大大快于社会政治的进步。于是,科技领域就渐渐与社会、政治和宗教秩序分道扬镳。两个文化领域之间的鸿沟是对人类世界造成日益增长的威胁的根本原因。这个文化大分裂影响到所有的国家:无论是中国和美国,欧洲和日本,印度和穆斯林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宗教的作用在每个国家都不同。有些社会里,宗教的地位举足轻重——比如伊斯兰社会——政治秩序却跟不上科技发展的步伐。即使是那些基本上世俗的国家,也不存在灵活的、有创意的政治秩序,能够保证既从科技进步中获取利益,也能控制大规模杀伤性的技术所带来的危险。今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对任何国家的生存都是威胁。

本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对这种威胁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里,美国和苏联拥有成千上万的核武器,但从 1945 年到现在,一枚核武器也没有被用于毁灭的目的。这个成就可以归功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相互威慑”战略,还要归功于有核大国的政府的谨慎小心的政策取向。今天,我们必须担忧的是,恐怖组织或无政府组织也许能够获取几枚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用这些武器来摧毁某个民族国家的政府。这个想法并不是标新立异。1995 年,日本邪教领袖麻原彰晃对东京地铁站发动了毒气袭击,目的是从国家内部摧毁日本政府,并以他的“真理教”的统治取而代之。毒气的杀伤力还不够大,但核武器就不同了。一旦宗教和其他暴力组织有能力获取核武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可能面临本书所提出的“从国家内部毁灭”的威胁。

所有大国的领导人都有防止“从国家内部毁灭”的共同利益。在不少国家里,大

大大小小的恐怖组织和邪教组织也许有一天会使用核武器阴谋夺权。所幸的是,我们应付这种危机还是有办法的。我在第五章中为政府防止“核夺权”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建议。其中有些措施在各国都适用,包括中国在内。比如:

- 研制和发展针对走私核武器的侦测系统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 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能否将民用工业生产迅速转移到应对危机的轨道上去。
- 国家领导人和高级官员在从内部发动的毁灭性打击中丧生之后,法律和行政上的人员替补措施是否有效。

国际间的合作也至关重要。2006年7月在圣彼得堡宣布的“应对核恐怖主义的全球动议”便是一个范例。在此基础上,美国和俄国已经开始合作,中国也有意参加。如果强国之间共同联手,它们能够在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为了防止全球的核失控,它们的合作既要有技术层面的内容,也要有政治内容。这些国家之间时而发生的争议和意见不合,不应当中断这方面的合作。审慎的政治家都会发现,在这方面的合作所取得的成果要超越其他的政治目标。说实话,合作的目的恰恰是为了保证自己国家的生存。

中文版的读者将十分幸运,因为此书的译者是相蓝欣。

相教授对英语的掌握完全到位,明白如何将这些最微妙的、复杂的概念用中文加以表达,并在两种语言之间游刃有余。当然,相蓝欣对尊贵的中文读者的贡献远远不限于他的语言才能。他对今日的美国社会和华盛顿的政治生活有全面的、及时的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的书中提及的社会政治问题采用的很多都是美国的例子。

蓝欣常去美国首都,在我的办公室和家中曾多次见面。记得某日,他和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国防部长中国问题主要顾问,译注)一起在我的家中度过一个愉快的黄昏,面对夕阳而坐,手执白兰地一杯,从中国和美国的艺术谈到哲学。我十分渴望在华盛顿更多地见到他,也许在上海更好。我曾去上海造访多次,但下一次去那里与蓝欣见面,岂非不亦乐乎?

2007年12月8日华盛顿

译者序言

相蓝欣

《国家的自我毁灭》是美国著名的军备控制专家、前国防部副部长、美国军控和裁军总署前主任弗莱德·查尔斯·依克莱博士的一部惊世之作。“9·11”事件以后,美国的精英战略家们开始进行反思,国会和白宫联手,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其主要成果是在情报和国土安全方面集中权力,进行了“大部制”改造:其一是将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国防部情报局等 16 个情报系统归总,设立国家情报总局,由资深外交官内格罗蓬特领衔;其二是设立国土安全部,并将所有涉及人口进出的部门加以整合。很多人以为,境外的恐怖份子在美国本土发动攻击的几率将大大减小。

依克莱的著作却语出惊人:在 21 世纪,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并非来自境外,而是本国内部。多年以来,在美国和欧洲的绝大多数人都曾以为,民主政治是国内稳定的根本保障,而西方民主国家都已经解决了这个体制问题。很少有人想过,无论什么样的政治体制都会面临同样一个“终极威胁”,即现存体制和政权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主义面前不得不俯首就范的可能。依克莱的这个观点对那些鼓吹“民主万能”的体制决定论者

不啻是当头棒喝。

在华盛顿的政策圈子里,也许只有依克莱博士最有资格提出这种似乎有点耸人听闻的观点。依克莱从来就不是书生论政,他是名符其实的“华盛顿内圈”人物,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在国防和军控体制内拼打,是美国国家安全领域中的主要思想家和实践家。在他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批新人后来都在国家安全领域里成了叱咤风云的人物,保罗·沃尔福维茨,里查德·珀尔,道格拉斯·费斯,白邦瑞……仅仅是这些国防部副部长,助理部长一级人物的名单就够长的了。在政治方面,他的倾向是新保守主义,所以他的众门生在小布什当政期间大行其道是意料之中的事。比如沃尔福维茨当上国防部常务副部长,是伊拉克战争的主要策划人。白邦瑞曾是拉姆斯菲尔德部长的首席中国顾问。

多年来我同依克莱一直有接触,不论什么话题,总是受益非浅。上次见面是2007年5月中旬,我同美国国家情报总局副局长汤姆·芬格等共同主办第三次美-亚-欧三边论坛。这个高层论坛是我同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日内瓦发起的,2006年在上海也开过一次。此次议题是中美能源和环保这类“非传统安全”问题。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国务院、情报部门均有要角出席,会议议程很紧张。刚结束的那天下午,友人白邦瑞开车来找我,说去依克莱家,在华府近郊的马里兰州。他的邻居有好几位是新保守派要人,所以我常戏称这里是“新保守三角州”。他家那个很大的室内泳池已开启,白邦瑞说,保罗(沃尔福维茨,时任世界银行行长)常喜欢到这里来游泳,聊天,读报。81岁的依克莱身体仍然健硕,双眼炯炯有神,但走路速度比过去慢了许多。他说,近来他们一批朋友相约,不读报纸的头版新闻,因为沃尔福维茨正不幸遭遇“世界银行女友门”事件,媒体穷追不舍,唯恐天下不乱。沃尔福维茨曾是我读研究生的约翰·霍普金斯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的老院长,说心里话,对他我还是十分同情的,这件事本不至于迫他辞职,但是欧洲盟国对其在伊拉克战争中的作用不能释怀,一定要调查到底,逼他就范,我们三个人都为此唏嘘不已。

那天风和日丽,夕阳西下时,我们手持白兰地美酒坐在拥有很多东方文物的大客厅里,从中国的张大千谈到美国的波拉克,从哲学谈到国际关系。当然谈得最多

的还是他的这本新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刚推出不久。他开始讲解这本书的思路。说实话,一上来我还有些闹不明白,听上去像科幻小说。了解了实际内容以后,我当场表示要在中国推出这部重要著作。老先生十分高兴,尤其是因为我将亲自翻译。

依克莱的特立独行的思维方式由来已久。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他就引起国防部高层的重视。当时他还是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的一位年轻的研究人员,别人都在研究热门题目,比如美苏核威慑战略,他偏偏钻研冷门,发现核武器在本国内的安全是严重的问题,因为美国部署的核武器目标虽是苏联,但发射核武器的操作规程缺乏安全保障,出现意外发射的可能性存在。于是他提出全面评估安全机制的建议,并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比如实行双人岗位责任制,防止精神或心理不正常的单人事故,还提出给所有的核武器加密码锁的举措。这个研究报告立即得到五角大楼高层的关注,29 岁的他受邀给军方将领们作了一天的报告,他告诉我,同这么多的高级将领打交道,其中包括美国战略核武器部队的司令,以组织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闻名于世的科蒂斯·李梅将军,他感到“战战兢兢,双膝发软”。

对于这位终生研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顶级专家而言,冷战结束以后,传统的“核威慑”战略不再生效,这本来是好事。但是,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却迅速地向全球扩散,其结果不能不令人担忧。小布什总统早在 2002 年就点过三个所谓“邪恶轴心”国家,即北朝鲜,伊朗,伊拉克。但这些国家并不是依克莱关注的重点。“9·11”事件以后,他以 75 岁高龄被任命为联邦“‘9·11’事件调查委员会”成员,他重新考虑新的安全威胁即源于在这个调查过程中发现的许多国家安全的漏洞。简单的说,“9·11”事件不过是将民航客机当做常规武器使用,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旦落入恐怖组织、邪教组织或任何无政府组织手中,他们将意欲何为?

凭借多年的研究和实际经验,他发现所有的民族国家,而不仅仅是民主国家将有可能面临一种灭顶之灾——那就是恐怖组织、邪教组织或无政府组织利用核武器、生化武器发动的摧毁国家现行政体的夺权行动。这是一种超越国家意识形态的、全人类面临的共同的“终极威胁”。

他认为,现在就采取果断行动还来得及避免这种大灾难。但是,为什么绝大多数国家的政策精英对此无动于衷,不愿研究和制定认真的防范措施呢?依克莱将这种忽略归于“尼采悖论”。尼采曾有一句名言:如果你向深渊窥视,深渊亦将窥视你。也就是说,对于将来未知的威胁,最好不要去想它,否则越想就越害怕,影响现时决策者的心态。依克莱认为,凡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都把对付境外威胁放在首要位置,认为国家的军事力量足以打击境内的反叛行动。所以,对一国内部今后会发生什么事只是政治家应当考虑的问题,而不是安全战略家应当注重的。

依克莱令人信服地说明,这种观念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迅速地、难以控制地扩散时代,已经完全过时。首先,当代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发展缺乏任何控制力。自18世纪以来,人类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分裂:一方面是变化多端,折冲往返的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崎岖发展道路;另一方面是披荆斩棘,一往无前的科学技术文化进展的坦途。但是,恰恰由于某些科技进步具有“双重用途”的特点:既能给人类带来福祉,也能给人类带来大灾难——特别是核技术、生化技术和计算机超人工智能,因此,科学技术同政治与社会在发展路径上分道扬镳的结果就有可能造成人类对技术进步和运用方面的失控。20世纪出现的以核武器为代表的能够毁灭人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便是一个明证。

在主权民族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里,防止核扩散几乎是不可能的,阻止这类技术被运用于大规模杀伤性的目的也达不到。但是,对使用核武器攻击别国的主权国家,我们仍然能够实施核威慑和报复性打击。但对于本国境内的反政府组织,无论是恐怖组织、邪教组织还是无政府组织,任何核威慑都不起作用,报复性打击也很难找到目标。种种迹象表明,这类组织获取核武器或生化武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目前的国际国内的体制下,发生“核夺权”的可能性比人们想象的要高得多。

从攻击的战术角度来看,发动核攻击只需要一个轻车简从的二人小组即可完成任务。譬如,将一枚核炸弹用小车携带到华盛顿国会和白宫之间的某个公共停车场,然后在远离起爆点的地方遥控引爆,既无需冒事先“踩点”的风险,也不会留下任何作案痕迹,而成功之后产生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依克莱将其称为“政治海啸”。

目前所有的民族国家都缺乏能够迅速应对这类危机的最高安全机制。

应当看到,任何一个遭受严峻的打击,但能够成功地化险为夷的政府,至少拥有三个要素:第一,政府的合法性未受质疑;第二,国民团结一致的基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第三,对付各种危机的跨部门的紧急计划早已制定,最高当局了然在胸,而且随时可以启动。没有集中统一的国家最高安全机制,应付危机的能力必然大大受制于部门之间的利益纠纷和官僚主义程序。

依克莱最担心的当然是美国。他认为美国在这三方面都有致命的缺陷。第一,核攻击至少会消灭半数的联邦议员和政府高级官员,美国的宪法制度给官员替补设置了种种程序障碍,于是在国难当头之时,联邦政府本身有可能瘫痪。第二,国民团结的基础有可能发生动摇。一方面,攻击者的身分可能一时难以确定,另一方面,联邦政府已经不能正常运转,于是某个自称能够胜任领导国家的野心家,其组织很可能就是作案元凶,将能够攫取国家权力并以紧急法令改变宪法基础。希特勒利用“国会纵火案”夺权使用的就是这个伎俩,从而扼杀了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第三,美国的国家安全体制迄今没有认真研究和制定紧急应对计划。国难当头之日,最高当局必然束手无策。

依克莱提出的种种建议,比如如何制定具有威慑力的计划,国会现在就应当通过政府高官的紧急替补法案,政府被授权在紧急状态下实行战时经济的转轨等等,不仅对美国有实际意义,对其他所有主权国家的政府都应当有启发。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指出:

本书的视野既是历史的也是前瞻性的。向前看,我们面临着一个革命性的、新的威胁,它不但威胁国家安全,而且能够毁灭现存的世界秩序。向后看,我们将意识到,面前的威胁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有着几个世纪的演化过程。今日的威胁——伊斯兰圣战式的恐怖主义以及生产核武器的“流氓”政权——也许应当被看作是这些历史趋势的外部特征,就像暴雨到来之前的疾风一样。军事战略家和政治专家中很少有人对即将到来的暴雨有着全面的理解,而理解它的历史意义的人就更是少得可怜了。

依克莱对具体事件的判断在今后是否得到验证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位耄耋之年的国家安全专家敢于挑战“尼采悖论”,带领我们一起向深渊窥视。正如亨利·基辛格博士所言,“弗莱德·查尔斯·依克莱对现代以来的历史做的引人入胜的描述,解释了世界主要大国在内部遭受灭顶之灾时能否生存下去的这个新时代”。我想所有的读者都会从这本书里受到启发和震撼。

前 言

本书的视野既是历史的也是前瞻性的。向前看,我们面临着一个革命性的、新的威胁,它不但威胁国家安全,而且能够毁灭现存的世界秩序。向后看,我们将意识到,面前的威胁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有着几个世纪的演化过程。今日的威胁——伊斯兰圣战式的恐怖主义以及生产核武器的“流氓”政权——也许应当被看作是这些历史趋势的外部特征,就像暴雨到来之前的疾风一样。军事战略家和政治专家中很少有人对即将到来的暴雨有着全面的理解,而理解它的历史意义的人就更是少得可怜了。

即将到来的危机是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结果,反映出人类进步的阴暗面。全球化保证了新技术的不停的传播,不管是对人类有利的还是毁灭性的技术。这个问题在核时代得到最明显的显露。直到冷战结束的阶段我们都一直以为能够把核威胁加以控制。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能够遵循一种防止使用核武器的战略。他们成功地保持了“不使用”核武器的国际机制,这是军事战略史上可圈可点的一个杰作。不幸的是,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不同

的世界。在度过了冷战的艰难历程之后,虽然结局圆满,我们现在却面临一个可怕的新困境。很多国家都争先恐后地启动核项目。表面上是寻求和平使用的能源,实际目的在于建立核武库。核技术扩散的问题还不仅限于此。大量的新闻报道表明,有核国家对核材料和核武器的控制力远远达不到安全的标准。这些报道的含义很清楚,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无法避免核武器落入“世界末日”邪教、无政府主义组织和恐怖组织手中。

其他的技术尚未引起媒体的注意,而它们的扩散更使得政府的控制力不从心。众所周知,生命科学的长足发展可以为生物武器的制造提供大量的技术。然而,最难控制的生命科学方面的革命性进展正是对人的思维进行控制的脑科学。也许在几十年之内,智能决策科学将会有重大突破。目前,一些强国已经建立了利用最先进的计算机来控制的指挥和决策中心。正如白昼过后必定是黑夜一样,这类计划将循序渐进地采用脑科学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新技术,将人脑的特殊功能同计算机的技术优势加以结合,创造出超人工智能,将一流的人类专家的能力远远抛在后面。在这方面的任何技术突破,都会造成如同猿人变成人类那样的革命性影响。这个飞跃将对所有的宗教带来根本意义上的挑战,并战胜所有的人类文明。它将使所有关于民族国家实力的传统概念都变得毫无意义。而且,从人类在防止核扩散问题上的经历来看,我们想依靠联合国来“控制”这种技术的扩散,那简直是荒谬绝伦。今天,美国的军事领导人使用计算机化的指挥中心,而中国正在试验用计算机化的决策中心为军事和政治决策服务。如果中国在超人工智能研究上处于领先地位,美国难道还要得到联合国的批准才能开始赶超中国的计划吗?

今天,我们的决策者和政策分析家只专注于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恐怖袭击活动。实际上,这类袭击,主要以自杀爆炸的方式进行,不可能击败成熟的民主国家,尽管对受害者带来的痛苦的代价是巨大的。即使对任何一个国家政权,如果其本身不是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也很难以这种攻击方法将它摧毁。事实上,当代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并没有克敌制胜的战略。他们的恐怖活动基于复仇和宗教乌托邦的强烈冲动。这些圣战恐怖分子似乎为自己的无能大为光火,只好用血腥和自残来获得快

感。这类谋杀行为固然对我们有伤害,但也促使我们增强军事实力,加强对国土安全的保护。这种恐怖主义并不能毁灭我们,只能使我们更加强大。

但是,恐怖分子、无政府主义分子和其他种种类型的恶势力正在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早晚会得手。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不过是想利用这种武器造成大规模的杀伤行为,但对如何取得持久的胜利并无任何有效的方略。然而,我们不应忘记,人类在历史上承受过多少由那些能够蛊惑人心并恐吓大众的领导人所带来的灾难。20 世纪的历史提供了许多生动的例子。在众多的恶人当中,希特勒也许最具有说服力。在当今的世纪里,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危险是出现一个新的希特勒,也就是出现一个掌握了某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富有个人魅力,具有非凡的战略头脑,手段残忍、机敏过人和野心无止境的人物。

这个新的危险暂时尚未登场,但已为时不远了。这样的富有感召力的邪恶领袖人物将能够从一个大国的内部实施攻击,不管这个国家的军事势力是多么强大,其警察队伍是多么称职。如果这个暴君式的人物具有非凡的战略头脑,他将可以针对精心选择的目标进行大规模杀伤性的攻击——并不需要国外的训练场地和外部恐怖组织的支持,也不需要发动跨越国界的军事行动。他将使被攻击方寻找不到实施报复行动的目标,使得这个国家的最强大的核威慑力量全然失效。相比之下,圣战恐怖主义运动梦寐以求的伊斯兰哈里发教权国的建立,反而会为民主大国提供大量的实施军事报复的目标。

这个新暴君人物的目的不在摧毁标志性建筑,劫持民航飞机,袭击火车站或者宗教神殿。他的目标将是使权力中心瘫痪,在全国范围内制造大恐慌,造成一种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他将充分利用这种混乱局面,乘虚而入,全面攫取国家大权,实施个人独裁。如果得逞的话,全球的民主国家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因为他们的民主世界、基本的民主机构,甚至公民的日常生活都将成为被争夺的对象。多数的民主国家生存在“借来”的时间里,生活十分安逸,因此缺乏应对即将到来的大灾难的意志和先见之明。非民主的国家也将是脆弱的——事实上在应付“内部毁灭”的危机时比民主国家还要脆弱。举例来说,在中亚的那些集权国家里,统治者面临的是

大量的、要求以宗教原教旨主义为立国原则的伊斯兰民众。在那里的首都只要爆炸一颗原子弹便能够制造出政治真空带。这将为一位宗教领袖(也许是像伊拉克的那位神职领袖穆克塔德·萨德尔那样的人物)动员其大量的追随者以攫取国家政权提供良机。

今日的军事计划者们对“内部毁灭”的前景并不十分关注。一种传统的看法是,世界将越来越趋向民主化,从而,世界和平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技术进步据说将使得这个世界的相互依赖的特点加强,也就是说,推动各国人民走向一个统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间的距离已经对旅行和贸易没有障碍,而且由于互联网的出现,距离对交流而言已经消失。所谓“平的地球”的吸引力使得人们忽略了科学技术进步的阴暗面。

本书中关于历史的讨论解释了我们目前困境的历史根源。如果我们希望避开眼前的致命危险,就必须明白这些危险的来源和历史演变过程。它们起源于250年前的西欧,根植于一场关乎人类文化的大分裂。当时的科学突然从政治和宗教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欧洲启蒙思想的地位上升使得宗教信仰的重要性降低。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新教的改革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政府的政策取向也越来越以促进自由市场经济为己任,支持技术进步,并从中获取可观的收益。

从那时开始,技术进步对人类的生存条件的改善起了巨大的作用。这些改善似乎使得那些毁灭和伤害行为中所运用的技术显得无关紧要。但是,在工业革命的初期,很多思想家就已经令人惊讶地对技术进步的阴暗面有所察觉。今天,我们开始理解当年的文化大分裂所产生的动力是多么可怕和危险。

正是这个分裂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事作风。一种是以宗教信仰为驱动力,以种族、民族传统和社会习俗为依据。这种思维和行事方式在大分裂之前就存在,而且多少年来一以贯之。它造就了基本的社会机构,促进了爱国和效忠国家的精神,是国家行为的驱动力。而另一种思维方式则根植于科学。其行动准则是寻求对自然规律的理解,基于实证方法而不是依靠多少代人传承下来的所谓“真理”。我们对宇宙的不断增加的知识使得我们能够对人居环境和人类生活条件

进行改造。从文化大分裂开始,科学和技术的长足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的影响又开始向世界其他地方进行传播,从而改变了我们这个星球的面貌。

人们也许会说,上述这个描述是传统解释方法。但是,传统描述所忽略的却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就是说,当年发生的文化大分裂目前仍然在扩大之中,而且越来越危险。技术进步和全球政治秩序发展的步调完全不相一致。

科学发现是积累式的,因此有可能产生飞速进步的效果。科学进步已经获得了内生的动力,从而达到自我持续发展的水平。但是,在政府管理和国际关系的领域里,进步和倒退,输和赢交替并行。个人自由获得之后,迫害便开始。和平之后出现战争,而战争又被新的和平所取代。宗教宽容之后出现神权治国的政府,而后又被更加世俗的政权所取代。自由贸易之后出现贸易保护主义,接着又出现倡导自由贸易的新的运动。总而言之,政治、社会和宗教事务总是沿着曲折的道路行进,而科学却总是在不断积累知识的基础上得到长足发展。

250 年前出现的这两种思维方式和行事作风的大分裂必将继续加深,因为两者的欲望不同,分裂的深化不可避免。科学与技术并没有一个终极目标。它们追寻的是用正确的理论来取代不正确的理论,其基础是征服自然的新知识。但是政治行为往往有终极目标。马克思主义当然不希望被资本主义所取代。伊斯兰教不希望被基督教所取代。美国之所以宣扬民主也是不希望产生集权政权。人类文化分裂的加剧也许会击败当今的世界秩序,从而威胁所有民族国家的生存。我们必须牢记,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够组织军队,寻求支持以击败恐怖组织,震慑侵略行为,执行联合国的决议。在现实世界里,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够保证这个世界具有一定意义上的秩序。国家从内部的毁灭并不是一种暂时存在的危险,而是一种经过两个多世纪发展的一种基本的历史性的力量所能够达到的终点和对世界的影响。人类军事史对我们应当吸取什么样的教训毫无启发,因为它不能够向民族国家提供如何应付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技术的传播所造成的后果。正是因为 250 年前的那场大分裂,我们才能够将“从内部毁灭”的前景带进当代人的视野。

我们应当承认,人类处在“浮士德的交易”的困境中。根据这个著名的中世纪